

苏州的刻书与藏书

许培基

中国的雕版印书，根据现有的文献纪载及已发现的实物资料推断。开始于唐代中期（公元八世纪后期）是比较可信的。就早期刻印的地方而言，是吴、蜀两地。蜀是今之四川省，吴在历史上包括的地区很广，今之苏州就是在吴的范围之内。苏州于宋代为平江府，元代为平江路，明初又改为苏州府。清代的苏州府包括吴、长洲、元和三县及常熟、昭文、吴江、震泽、昆山、新阳共九县，府治在今苏州市，民国时称吴县，包括今之苏州市及吴县。本文所述主要限于今之苏州市及吴县地区。

苏州地处长江以南，太湖之滨，气候温和，物产富饶，人口丛集，文化发达，刻印书籍的客观条件具备，成为我国刻印书籍重要地区，不是偶然的。

刻书与藏书，是互为促进，互相因果的。苏州湖山毓秀，水土清嘉，自古以来好学之士，以积书藏书著称者代不乏人，文人学士撰述之多，雄冠东南。他们所收藏的图书典籍及本人著述要刊刻流布，这是推动版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著名的藏书家也是刻书家，而刻书事业的发展，又为藏书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佛教的兴盛。唐代由劳动人民创造发明的雕板印刷技术，首先用于刻印民间通行的历书，唐太和九年前后，苏州一带地方也有这种刻印品出售。而佛教徒则利用来刻印佛象、佛经，宣扬佛法。南北朝时江南梵刹林立，唐代著名的诗人杜牧诗：“千里莺啼绿映红，山村水郭酒旗风，南朝四百

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明了江南梵刹之盛。苏州寺庙至今尚存者，如灵岩山寺、西园戒幢律寺，以及闻名中外的寒山寺，都构筑藏经楼；灵岩、西园和光福的圣因寺，藏经楼的规模都较大，收藏的佛经极为丰富，而北宋初期苏州的承天寺，据传就是刻经造纸的著名工场。由此可知，苏州刻印书籍始于唐代，到北宋已较发达，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宋代刻书，有官刻、私刻、坊刻。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兼判国子监李至上书申请开始刻印《史记》、《前汉书》，至真宗景德二年（1005），儒家经典及史书的刻印发展极快，并刻印唐人文集。至神宗熙宁（1068）以后，放松了刻印书的禁令，私刻、坊刻风起云涌，大大有利于刻印书的发展而遍及全国。当时中央政府刻书是以国子监为首，地方刻书有公使库。公使库犹今之地方政府的招待所，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载，就有十多个。哲宗元符间（1099）苏州公使库曾刻印过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除了公使库以外，还有各路茶盐司、漕司、提刑司等机关，州军学、郡斋、郡学、郡庠、县斋、县学及各处书院都刊刻书籍，熙宁九年（1076）权知吴县事葛繁刻印过《韦苏州集》十卷，元丰三年（1080）苏州太守晏知止刻印过《李太白集》三十卷，看来都是官刻本。而远在嘉祐四年（1059）王琪刻印的《杜工部集》二十卷附补遗，就是姑苏郡斋刻的。

南宋时期，苏州刻书据陈彬和《中国书史》所录，平江府于高宗绍兴二年（1132）刻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四卷；孝宗乾道二年（1166）刻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二十卷；乾道六年（1170）平江府学刻《韦苏州集》十卷；宁宗嘉定五年（1212）吴郡学舍刻吕祖谦《大事记》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嘉定间，吴郡守李伯珍刻过唐白居易《白氏文集》七十一卷；理宗绍定元年（1228）苏州知府李寿朋刻范成大《石湖志》五十卷，等。

宋代私家刻书，据《天禄琳琅书目》、《书林清话》所载，有三十二家。陈彬和《中国书史》则录有四十六家。其中有姑苏郑定刻《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实际上郑定所刻是嘉兴本。宋代苏州私刻本，据文献述及当有不少，例如北宋宣和间，姑胥居世英刻《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茗溪渔隐丛话》说它是很少错误的善本。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沈宗举等刻过景德寺僧法云《翻译名义集》七卷；嘉泰三年（1203）范莘刻印过范成大《石湖居士诗文集》一百三十卷；绍定六年（1233）朱梦炎刻过朱长文《琴史》六卷；宋末郡人刘瑄还编刻过《诗苑众芳》一卷，等。

现在唯一可征的实物资料就是佛经中的《磧砂藏》，它是南宋平江府磧砂延圣院的刻本。延圣院于孝宗乾道八年（1172）由寂堂禅师创建。理宗绍定四年（1231）设经坊一名大藏局，开始刻《磧砂藏》。到元代英宗至治二年（1322）完成，历时九十一年。全藏共五百九十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梵夹装。今西园寺藏经楼所收藏的《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框高24.6厘米，每开六行，每版三十行，行十七字，版心镌有“羊三”，经末有“延圣比丘清满书”字样。清满是《磧砂藏》的主要写经人之一，就是该院的宋刻本了。这可以说是宋代苏州刻印书籍的最早实物资料。

1978年4月，苏州城内瑞光塔发掘出一批文物。其中有《大随求陀罗尼经》一叶，高44.5，宽36.1厘米，有边框，两边各有一行字。右行自“朝请大夫给事中，知苏州军事清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去华”起，有一连串职官姓名；左行最后为“进士郭宗孟书”，经咒中心为释迦象，环以汉字经文，四角为四天王像，上部正中有图案，下部正中长方形框内印有“剑南西川成都府净众寺讲经……沙门蕴仁……同入缘男弟子张日宣……同入缘女弟子沈三娘……咸平四年十一月 日杭州赵宗霸

开”。另一张梵文经咒，高25、宽21.2厘米，类似1944年四川成都古墓中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这是把我国古代二十八宿和巴比伦黄道十二宫画绘在一张经咒上的星官图。中间框内有“北宋景德二年八月 日记”的题记。还有木刻《妙法莲华经》一部，卷轴装，原七卷，卷六被毁，纸土黄色，高16.8厘米，纸质为桑竹混合料，每卷十六块版，版长51.5-55.5厘米，每开88行，每行24字。第一卷引首部分有朱书题记“天禧元年九月初五日，雍熙寺僧永宗转舍《妙法莲华经》一部七卷，入瑞光院新建多宝佛塔相轮珠内……”。这是一部极少见的北宋初期木刻经卷，字体端正，刻工精细，可以和开宝年间蜀刻官本相比美。据苏州博物馆鉴别推断，该刻本的年代是北宋太宗雍熙年间（984-987）。由于它是经过补版后印刷的，不同于初版，则初版开雕应早于上述时间。再从没有牌记和题记的情况看，雕版时间在五代吴越王的末年是不可能的，但完版时间不可能早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而开宝九年（976），当时南唐已亡于宋，吴越已陷于包围之后，即太平兴国元年至三年（976-978）吴越纳土归宋以前。以上三种刻本是否刻于苏州，尚待研究。如果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苏州刻本，那么苏州刻印书的实物资料则可推前至北宋初期了。

如前所述，刻书与藏书是互相推动、互为因果的，像苏州公使库所刻《吴郡图经续记》的作者朱长文，就是北宋苏州著名的藏书家。他是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进士，藏书达二万卷，集周穆王以来金石遗文、名人墨迹，有《墨池编》、《阅古编》等金石专著。与他同时著名的藏书家还有：

章甫，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进士，藏书万卷。

叶梦得，字少蕴，吴县人（1077-1148），是南宋苏州著名的藏书家，藏书在十万卷以上。他于灵川弁山山居建藏书楼，后经兵乱及火灾，藏书差不多全部散失。但又重新收集，建“皕书阁”。他又是一个作家，撰述有《石林春秋传》、《石林居士

建康集》、《石林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石林诗话》等。

以上是宋代苏州刻书及藏书的一般情况。

元代刻书，继承宋代传统，也分官刻、家刻和坊刻。元世祖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提倡中国儒学，拨发公款雕印汉文图书，颁布学校使用。因而官刻图书遍及全国各地。官刻本中以中央政府中书省的“兴文署”所刻最为知名。地方刻书则由各路儒学（当时全国各路、府、州、郡、县都设立儒学）刻了不少书。平江路儒学于大德十一年（1307）刻过宋欧阳修《新唐书》255卷；天历二年（1329）刻过陆森《玉灵聚义》五卷；至正二十五年（1365）刻吴师道校正鲍彪注《战国策》十卷。吴郡庠于至正二十三年刻过宋沈枢《通鉴总类》二十卷。此外就是各地书院。元代全国书院有一百二十多个，叶德辉《书林清话》列出较著名的五个书院中，就有“平江路天心桥南刘氏梅溪书院”曾刻印《郑所南先生文集》一卷，《清雋集》一卷，《百二十图诗》一卷，《锦残余笑》一卷。

元代各地大小教育机关刻书成风，官家提倡于先，私家风行于后，苏州私家刻书也很多。如元初，磻砂寺僧魁天纪刻过《唐三体诗》二十卷；郡人俞琰刻过自撰《周易集说》四十卷、《周易参同契发挥》三卷、释疑一卷；元天历间，范氏岁寒堂刻印过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遗文一卷，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奏议二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补编一卷；至正间，师子林僧惟则刻印过《师子林剩语》五卷，别录五卷，《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会解十卷；郡人高德基刻印过周伯琦《说文字原》一卷，又《六书正譌》五卷；郡人徐达夫编刻过《传道四子书》八卷，张雨《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三卷，等。元代坊刻，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列出比较著名的就有七十九家。在这种风气下，我们很难

想像苏州就没有刻书，可惜的是没有知见的传本，也没有确切可靠的文献纪录。

元代著名的藏书家，陈彬和《中国书史》列出了九人，其中苏州就有袁易、陆友、沈景春、张雯父子三代，占了将近一半。

袁易字通甫，筑室长洲之蛟龙铺，不乐仕进，所居西偏房曰“静春堂”，堂中有书万卷，都是他亲手校定。《四库提要》著录《静春堂集》四卷，说：“元袁易撰，易居吴淞具区之间，筑堂曰静春，聚书万卷。”

陆友字友仁，亦字宅之，平江人。他的父亲是一个经营布业的商人，但对他的儿子酷爱于读书和藏书却很支持。黄缙《陆氏藏书目录序》说：“吴郡陆君，居闾阓中，四壁之外，辄与贾区直。君殊不以为溷，一榻萧然，环以古今图书若干卷，自经史传记，下至权谋数术，汜胜虞初，旁行数落，百家众技之文，櫛比鳞次。入其室，如登群玉之府，而探蓬莱道家之名山，忘其为居之隘也。居既第其篇帙，部分类别，为之目录，以便览者，且属余使序之。”由此可知他藏书的内容非常广博。他自号研北先生，著有《研史》、《墨史》、《印史》、《杞菊轩稿》。一个市井商人的儿子成为一个著名的藏书家、著述家，也是同环境的影响有关的。

沈景春，《丽宋楼藏书志》著录《啸堂集古录》载《干文传跋》说：“景春沈君，居乐圃坊，与予同游可村贺先生之门。平生寡嗜欲，惟酷好藏书。有别业在閭门西，去城仅数里，景春昔尝居之，人有挟书求售，至必劳来之，饮食之，酬之善价。于是奇书都归沈氏，《集古录》其一也。”

张雯字子昭，少嗜学，兼通声律。家临市衢，构楼蓄书，自经传史子，下逮稗官百家无不备。日翻阅研究，年六十四，卒于至正十六年。子田，字耘已，亦工文词；田子肯，字继孟，一字寄梦，也是一个能继承祖业的藏书家和学者。

苏州的刻书、藏书至明代而盛极一时。

明代刻印书籍也可分官刻、私刻和坊刻。官刻书中有内府刻的，有各直省刻的。内府即皇室的刻本，由司礼监领其事，设经厂专刻书籍，后人称之为经厂本。各部院及南北国子监也刻书。各地方官府刊本则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所刻。很多府县都刊刻本地的方志。各地儒学、书院、监运司也间或刻印书籍。各直省刻书以苏州府刻的为最多。明初，都是以官刻为主，坊刻为辅，私刻相比之下不很发达。坊刻则以福建地方为最发达。明代刻书就地方而言，则苏、浙、皖、闽是刻书中心。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经籍会通》卷四说：“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又说：“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歛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又说：“吴会金陵刻书最多，商贾所资，两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勿与。”可见明代刻书，苏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明代苏州刻书所以如此兴盛，并以精美著称于当时，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经济的繁荣发达；第二有技术精巧之刻工，当时苏州著名的缮写工人有：吴时用、章仕、陆廷相、何伦、徐冕、缪渊等。著名的刻工有：李清、李泽、李潮、李朴、李经，季宅、黄周贤、黄金贤、陆奎、陆敖、陆宣、陆潮、陆淮、陆信、陆宪、袁电、袁宸、章悦、章景华、章亨、章庆、章甫言、何瑞、何其、何钥、何凤、何忠、何朝忠、何大节、何应元、何应亨、何应贞、何受、何礼、何序、何升、何鉴、何磁、何钤、徐仁、徐敖、周永日、刘松、唐琼、高成、王诰、马龙、马相、张凤、张敖、张本、严椿、陈汶、陈节、应钟、顾廉等；第三，著名的学者、藏书家都冠绝于前代。蒋吟秋辑《吴中藏书先哲考略》列举宋代五人，元代五人，明代有五十二人。他们博采精粹秘笈，广搜古籍善本，建崇楼，筑别馆，百宋千元，缥

细插架，参稽互证，搜亡揭隐，在明代二百五十余年 间，不仅对吴下东南，而且对全国的学术文化都有极大影响。在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雕版刻书掀起了一个翻刻、仿刻宋版书籍的热潮，首先是在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以苏州为中心的地区发端的，正是由于这些文人藏书家的倡导，发端于家刻，延及官刻、坊刻，并很快扩展到全国广大地区。他们竭力摹仿宋版、保持宋版原貌，其中精刻、精印者几可乱真。由于其扩展迅速，影响深远，形成了较之前期版刻迥然不同的一代新风。这不仅影响了当代，乃至清代及民初。我们今天出版印刷的宋体字，也于此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我们保存了一大批宋刻风貌的文化典籍。

当时最著名的刻书家、藏书家和他们刊行的尤称赏于当世 的精刻有：

陆元大，正德间苏州书贾。据顾元庆《夷白斋诗话》载，陆原来是洞庭涵村世家，晚岁业书，浮湛吴市，尝刻漫稿。他于正德十四年(1519)借得都穆家藏宋庆元徐民瞻本《陆士衡文集》、《陆士龙文集》而复刻《晋二俊集》二十卷。正德十六年(1521)他又复刻了宋绍兴建康郡斋本《花间集》十卷。二书字体端秀，工雅可观。书商多铲其牌记，伪充宋本。

黄省曾，字勉之，吴县人。弱冠与其兄鲁曾散金购书，覃精艺苑，好蓄异书，于书无不览。他以“文始堂”“前山书屋”“南星精舍”等室名刻了很多精本。嘉靖十三年(1534)复宋合刻《水经注》、《山海经》，字体精整秀美，是仿宋方块字之代表作。《天禄琳琅》有一藏本，书贾以其规仿宋槧，因将黄省曾总序之“嘉靖”之“靖”字挖去，填改“定”字补于纸上，冒称宋本。可见其仿宋镂版之精。黄省曾还刻有《申鉴注》及自著《五岳山人集》。其兄鲁曾刻印《孔子家语》、《方脉举要》，后者是苏州名刻工黄周贤所刻。其弟贯曾的浮玉山房刻《唐诗二

十六家》，省曾子姬水刻《前后汉纪》，也很精美。

王延喆，字子贞，吴县人，大学士王鏊之子，多藏善本、称“恩褒四世之堂”，亦好刻书。嘉靖四年（1525）取旧藏宋建安黄善夫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重加校仇，翻刻于家塾，至嘉靖六年（1527）书成。版式字体，悉依宋本，精雕细刻，为世所称。王士禛《池北偶谈》载有其书刻印后连原书主人也难辨其真伪的逸闻，可见其刻书工艺之精。

袁褰，字尚之，吴县人。累试不第，一意好古，晚耕谢湖之上，自号谢湖。家有磐石斋，又有嘉趣堂，刻书极富，多为佳槧。嘉靖十三年仿宋刻《大戴礼记》十三卷，十四年仿宋刻《世说新语》三卷，还刻有《四十家小说》、《后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金声玉振集》。最著名的是嘉靖十三年（1534）开雕、至二十八年（1549）竣工的复宋广都裴氏本《六家文选》，是吴中名匠周慈书写，李清、李经、李泽、李宗信等镂版，摹刻甚精，校勘亦审。袁氏自云“用费浩繁，梓人艰集”。叶昌炽盛赞它是“世所称以精绝”。因其刻印考究，多为书贾割裂牌记，谬称宋槧。《天禄琳琅》所藏十部中，作伪者居九。袁氏刻书，卷末有“校于藏亭”、“重雕于袁氏嘉趣堂”、“袁氏两庚草堂善本雕”等标记，多为行书刻写。“藏亭”是袁氏书斋，“两庚草堂”为其藏书之所，“嘉趣堂”是专为刻书场所，而苏城吴趋坊陆姓等是袁氏经常雇请的写刻工匠之家。

顾春，苏州人，别号东沧居士，官怀远将军，室名“世德堂”。嘉靖十二年（1533）刻《六子全书》（《道德经》二卷，《南华真经》十卷，《冲虚至德真经》八卷，《荀子》二十卷，《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十卷，《中说》十卷），字体遒劲大方，版式手工俱佳，展卷令人赏心悦目。嘉靖十三年又刻《王子年拾遗记》十卷。

苏献可，苏州人。其通津草堂所刻《韩诗外传》十卷，《论

衡》三十卷，字画嶄然，横轻直重，也是苏州良匠周慈、陆奎等杰作。

沈与文，字辨之，吴县人。刻书题“野竹斋”，亦题“繁露堂”。士礼居跋《邵氏闻见录》云：“吴中杉渚桥，嘉靖中有沈与文蓄书颇富，刻《韩诗外传》十卷。”此本与苏氏通津草堂本款式相同，浑如一体。前人有诬沈得苏版，剜补后占为己有，然细检两本，字体略异，苏肥而沈瘦，实为两刻。此外他还刻有《唐荆川集》、《西京杂记》二书。

金李，苏州人。其“泽远堂”于嘉靖七年(1528)复宋刻的韦昭注《国语》二十一卷，宋体字摹刻精妙，宋讳都缺笔，惟淳字不避，因其源出于南宋初本。

龚雷，字明威，长洲人。嘉靖初曾由府学贡生做过知县。他复刻宋绍兴本《鲍氏战国策注》十卷，刻印并工，与金李刻《国语》同时同式，恰似姊妹篇。

郭云鹏，字万程，嘉靖己未(1559)进士，官刑部主事，自称“吴会郭云鹏”、“吴下后学”，室名“济美堂”，一名“宝善堂”。嘉靖中复刻宋廖莹中世綵堂本《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附录二卷，集传一卷，后序一卷。又刻《曹子建集》十卷，《欧阳先生文粹》二十卷，补遗一卷《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三十卷，并称精妙。

徐焞，其“万竹山房”于嘉靖三年(1524)复刻宋姚铉所辑《重校正唐文粹》一百卷，写善镂精，一笔一划勿称即改之。

万历以后，刻书中心从吴中逐渐向浙江吴兴、安徽歙县一带转移。这时戏曲小说刻印日多，新编类书、丛书的刊行也日渐发达，文人文集出版更多。而由于各种文学流派的更迭发生，诗文集更层出不穷，还有地方志的编纂出版，比宋、元两代更为兴盛。

在丛书、小说中，苏州顾元庆刻的《四十家文房小说》是历代藏书家称道的善本，清代校勘学家黄丕烈对此书甚宝爱之。他

于清嘉庆十七年得其一种，特为加跋云：“《开元天宝遗事》上下，顾氏文房小说本也，仅明刻耳。在汲古阁毛氏时已珍之，宜此视为罕秘矣。”元庆字大有，学者称“大石先生”，明长洲人，兄弟都纤啬治产，元庆独以书史自娱。自经史以至丛说，多所纂述，所居顾家青山在大石山左麓，山中有胜景八，自为之记。名其堂曰“夷白”，藏书万卷，择其善本刻之，署“阳山顾氏文房”，今苏州博物馆有此藏本。

苏州的地方志中，王整纂修的《正德姑苏志》六十卷。《吴县志》是明崇祯十五年刻本，余如嘉靖间杨循吉纂刻的《吴邑志》，隆庆间皇甫汸纂刻的《长洲县志》等。其它如嘉靖刻本《虎丘山志》，万历刊本《吴中灵岩山志》八卷及《尧峰山志》。

小说中，姑苏叶氏刻《王状元荆钗记》全卷，汤显祖撰的《邯郸梦》三卷二十九出，附对幅插图十幅。此书是吴兴闵光瑜重刻，但第一幅插图，就有“吴门王文衡写”的标记。明万历丙辰(1616)刻的《樱桃梦》，附半幅版插图二十幅，刊明长洲钱谷写。谷字叔宝，号罄室，是文征明的弟子，也是著名藏书家。明代徽派版画，名重一时，很多书籍中的插图都是徽派版画的杰作，然而插图的作者很多是苏州的画家。

如前所述，明代刻本的形式，嘉靖以前完全沿袭元代风气，版式全是黑口，多半是大黑口，字体都是软体，装订全是包背，几乎和元刊没有区别。嘉靖以后，从苏州开始掀起了翻刻、仿刻宋本的新风气，白口盛行，版心上方往往有字数，下方往往有刻工姓名，有时有写梓人姓名，字体又转向欧、颜一派，整齐严谨，到万历年间，更趋方正，终于发展成横轻直重的所谓“宋体字”。万历以后刻书多滥，不为世重，但苏州仍有一些书保持了嘉靖时遗风，堪称佳槧。其中如：

徐时泰，字大来，长洲人，万历庚辰(1580)进士，官太仆少卿(一云工部郎中)，题“东雅堂”，其复宋廖莹中世綵堂本《昌

黎先生集》摹刻精良，字画秀美，与郭云鹏济美堂刻《河东先生集》源出一家，款式全同，堪称兄弟集。

又如，吴郡王氏世经堂刻《弇州山人四部稿》，顾绍芳刻《宝庵集》，周氏书带斋刻《汝南圃史》，崇祯时赵均小宛堂复宋陈玉父小字本《玉台新咏》，顾凝远诗瘦阁刻《济北晁先生鸡肋集》七十卷，《松陵集》等，摹刻甚精，可称嘉靖间摹宋、仿宋的余波。

除以上这些刻书家兼藏书家以外，明代苏州著名的藏书家还有：

杜琼，字用嘉，博综古今，自号鹿冠道人，晚年徙家东园，得朱长文乐圃家焉，学者称东原先生，卒年七十八，门人私谥曰渊孝先生。收藏书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是吴门画派的创始人。《式古堂画考》云：“石田有竹石居图卷，周鼎题诗云：‘头白话今雨，汗青藏古书’；吴璠元玉和云：‘有田皆种石，无屋不藏书。’”

朱存理，字性甫，长洲人。闻人有奇书，辄从以求，以必得为志。或手自抄录，动盈篋笈，群经诸史，下逮稗官小说，无所不有。尤精楷法，手录前辈诗文积百余家。所纂有《经子钩元》《吴郡献征录》、《名物寓言》、《铁网珊瑚》、《野航漫录》、《鹤岭随笔》，总数百卷。

吴宽，字原博，号匏庵，成化八年会试、廷试皆第一，官至礼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静志居诗话》：“是时吴中藏书家都以秘册相尚，若朱性甫、吴原博、阎秀卿、都玄敬辈，皆手自抄录。匏庵遗书流传者悉公手录，以私印记之。前辈风流不可及也。”抄本用红印格，手书精采奕奕，笔法绝似苏长公。其藏印曰“古太史氏”，曰“延川来季子后”，曰“双井村人”。有《丛书堂书目》一卷。

閻起山，字秀卿，喜积书，见书必力购。家惟一童，日走从

友人借所未读书，手抄口吟日夜不休，所获学俸，尽费为书资。家甚贫，或断炊，质衣而食，而爱其书不忍弃。

都穆，字玄敬，吴县人，弘治进士，官太仆少卿。尝奉使至秦中，访其山川形势，故宫遗址，作《西使记》，搜访金石遗文，作《金薤琳琅》。归老之日，斋居萧然，日事探讨，或至乏食，辄笑曰：“天地间当不令都生饿死。”其好学旷达如此。

王献臣，字敬之，以锦衣卫籍举弘治六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大同边，后谪上杭丞，再谪广东驿丞。武宗立，迁永嘉知县，移高州通判，致仕归苏州，筑拙政园。《平津馆鉴藏书籍记》载《经籍考》，有“吴门王献臣家藏私印”、“诗礼传家”、“王氏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虞性堂书画记”四朱印。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晚皈心佛乘，自号六如，筑室桃花坞。明文征明饮子畏小楼诗：“君家在皋桥，喧阗市井区，何以掩市声，充楼古今书，左陈四五册，右倾三两壶。”寅读书每夜尽一卷，用朱黄识其旁，卷尽辄写山水禽竹，其端或书小诗，或括前意写一二语，或记月日。藏书有“南京解元唐寅记”、“唐伯虎印”、“梦墨亭”、“唐居士印”、“六如居士印”、“学圃堂珍藏书籍”诸印。

文征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征仲，别号衡山，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楨，学画于沈周。又与祝枝山、唐寅、徐祯卿相切磋，名日益著。正德末授翰林院待诏。其藏书引首皆用“江左”两字长方印，或用“竺坞”印，“停云阁”印。其余藏印曰：“玉兰堂”、“辛夷馆”、“翠竹斋”、“梅花书屋”、“梅溪精舍”、“玉磬山房”、“烟条馆”、“悟言室”、“惟庚寅吾以降”等。其长子文彭，字寿承，号三桥，其藏书印曰“渔阳子”、“清白堂”。次子文嘉，字休承，其藏书印曰“归来堂”、“文水道人”、“肇锡余以嘉名”。文彭之子文元发，字子排，其藏书印曰“三楚精神”。征明侄文伯仁，字德承，号五

峰，又号葆生、摄山老农，其藏书印曰“元珠室”、“玉峰樵客”、“双玉兰堂”。元发之子文震孟，字文起，号湘南，天启二年殿试第二，授修撰，历官东阁大学士，谥文肃，其藏书印曰“石经堂”，曰“两月平章”。文嘉之孙文从鼎，字定之，万历甲午举人，其藏书处曰愿贤堂、心远阁、惜阴斋。他们祖孙四代都是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

彭年，字孔嘉，自号隆池山樵，藏书处曰寒绿堂、云光阁。

王宠，字履吉，号雅宜。居林屋三年，既而读书石湖，由诸生贡入国子，于书无不窥，手写经书皆一再过。藏书印有“铁砚斋”。

柳金，字大中，号安愚，别号味茶居士。所校《水经》以宋槧手抄改正错简，如潁水篇、渠水篇、隐水篇，皆有大功，其读书处曰清远楼。

钱同爰，字孔周，号野亭。其积书甚富，除经子史外，山经地志、稗官小说，无所不有，无所不窥。遇有所得，随手札记，积数巨帙。

顾璘，字华玉，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著有《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凭几集》五卷续集三卷，《息园存稿》诗十四卷文九卷，《缓恻集》一卷，《顾尚书书目》六卷。

袁翼，字飞卿，奇文秘苑，日讨寻不厌。闻有异书，辄奔走求之，至解衣为质弗惜也。晚年深藏不出，读书自娱。

朱良育，字叔英，正德中贡生，著有《草堂诗集》十卷。有“吴郡西崦朱叔荣书画印”、“叔荣”、“西崦”、“吴郡朱叔英西崦草堂”印。

顾德育，字克承，号可求。家贫好学，手录数千卷。其藏书处曰安雅堂。

钱谷，字叔宝，游文徵明门下，葺悬磬室，读书其中，闻有

异书，虽病亦强起匍匐请观，手自抄写，几于充栋，穷日夜校勘，至老不衰。其藏书印文为“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借不还遭神诛，子孙不宝真其愚”，又有“十友斋”“中吴钱氏”收藏印。

陆师道，字子传，号元洲，寻更曰五湖，嘉靖戊戌进士，官工部水司主事，改礼部仪制。手钞典籍积数千百卷，小楷精绝。

陈道复，初名淳，后以字行，更字复甫，号白阳山人。少从文征明游，所棲曰五湖田舍，多藏书。

张寰，字允清，正德辛巳进士，官通政使参议。其藏书处曰崇古楼。

吴岫，字方山，号南濠居士，明嘉靖时人。其“尘外轩”聚书逾万卷。著有《姑山吴氏书目》一卷。

金俊明，字孝章，别号耿庵。善书，平居缮录经籍秘本及交游文稿凡数百种，无不装潢成帙，筑“春草闲房”贮之。

以上说明，明代苏州的刻书藏书确实盛极一时。

在明代刻印书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活字印刷术受到社会的重视。苏州和无锡、常州、南京一带是活字印刷最发达的地区。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唐五十家诗集》，徐鹏所作的序言中认为是正德年间苏州铜活字印本，又为苏州在明代刻印书的兴盛，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物证。

清代刻印书籍可分前后两期，自清初至鸦片战争为前期，鸦片战争至清末为后期。

清代前期刻印书籍总的来说，比明代又进了一步。从刻书的地方而言，以南京、苏州、杭州为最多最好，随后是四川、广东、江西等地。由于清朝是以满族入主中国，对汉族施行高压政策，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虽然这些反抗被武力镇压下去了，但民族思想并未泯灭，明末遗民中许多有民族气节的人，没有力量同清朝抗衡，于是走上钻研学术、从事著述的道路。清初

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等，他们的著作，在学术上、文学上超过前代，还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思想。清朝政府对这些读书人，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又以稽古右文为号召，编纂大部头的书，笼络知识分子。康熙时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就是继明代《永乐大典》之后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乾隆编《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征书重点，当然是江浙两省。江苏进书两次共一千二百二十六种，其中苏州当不在少数。这些书大多被全毁或抽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读书人，慑于文字狱的淫威，害怕做诗词文章发议论，招来杀身之祸，就埋头于故纸堆中，钻研古人著作，了解古人语言，发展了音韵训诂之学，并扩大了校勘学、考据学的范围，成为后人所称的“乾嘉之学”。这些校勘学家的口号是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所谓“以贾还贾，以孔还孔”。这对于乾隆修《四库全书》、篡改古书是一种反抗。校勘学的发展，对于整理古书是有功的。许多著名的校勘学家如戴震、段玉裁、卢文弨、顾广圻、孙星衍等，他们校订了不少古书，使得许多从前无法了解或不易了解的古书，有了可读的传本，对于保存古代的文化典籍，研究古代学术思想是有很大贡献的。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许多人从事搜辑已经亡佚的书籍，编辑成书，发掘出了很多已经失传的古籍。同时也出现了以刻印一个地方先人的著作为目的的丛书，称为郡邑丛书，对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有很大好处。这些都对有清一代的刻书有重大影响。在刻印书的技术上，宋代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更趋成熟，出现了木活字、铜活字，乃至锡活字、泥版、磁版。所以清代三百年间，刻印书籍的数量品种之多是超乎前代的。也是由于校勘学的影响及明嘉靖时仿宋、翻宋的余风所及，到乾隆、嘉庆时，影刻宋本，更为精审。苏州在唐、宋时期是刻印书籍的一个重要地区，到元、明而盛极一时，清乾、嘉时又是刻书最多最好的地区之一，许多校勘名家都出在苏州。由此可见，苏州在刻书事业上的贡献，在中国古代

学术文化发展史上，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私家藏书之盛，也许是无与伦比的。

如清初官刻，乾隆在《四库全书》纂修告成以后，将难得之书用木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苏州翻刻的就有二十六种。晚清各省设官书局，江苏官书局设在苏州。其收集的木刻书版，于解放后仍保存在苏州图书馆，1958年，我曾组织力量整理，存188种74,086片，其中如黎庶昌刻的《古逸丛书》，贵池刘世珩的《暖红室传奇》，都比较完整。这些书板于1962年根据江苏省文化局决定，移交给扬州广陵书局后，曾补版印出《西厢记》一书。

在清代前期，刻印书籍中值得一提的，就是书籍中的插图及版画。徽派版画盛于明代，但从事绘图及版刻的人中不乏吴中名匠，有些还刻于苏州。如《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中，收录《东西汉传》，明甄伟撰，袁于令评，是明天启（1621—1627年）苏州白玉堂刻本。又杨慎撰《历代史略词话》，也有苏州刻印的插图，刊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入清以来，版画艺术虽日渐衰落，然而在顺、康、雍、乾四朝，还不乏佳作，其中有些仍是苏州人的作品。如康熙间吴门柱笏堂刻本《凌烟阁功臣图》，封面刻“刘源敬绘凌烟阁，吴门柱笏堂受梓”。刻工朱圭为吴中名匠。刻图以纤丽工致著名。除此而外，又刻《耕织图》、《万寿盛典图》、《石濂和尚离六堂集》的附图。康熙间，苏州文喜堂刻清朱罐撰《秦楼月》，书内系演扬州女子陈素素与吕贯遇合的故事，后附《素素二分明月集》，附图七幅，刻工是徽州名匠，但刻于苏州。还有乾隆间刻《西湖佳话》十六卷十六篇，题古吴墨浪子搜辑。此书除杭州文翰楼刻本外，还有金闾学耕堂刻本，版式小，属巾箱本，另有金闾绿荫堂袖珍本。书籍中的版画插图，虽然入清以后逐渐衰落，但苏州桃花坞木刻版画，却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至今仍是苏州著名的工艺美术。

清代的精刻本，除翻宋、仿宋以外，从康熙开始又兴起了软写上版刻书的风气，有很多书都是由名书法家精心缮写付刻的。如福建著名书家林佶的“林氏四写”，其中汪琬的《尧峰文钞》，是吴郡良工程际生所雕。康熙三十八年顾嗣立秀野草堂刻的《韩昌黎先生诗集》，为吴郡名刻工邓明玘、曾唯圣所刻。康熙四十二年刻印的《汤子遗书》，是古吴范稼庵写，金陵名匠刘文藻刻。嘉庆时，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手写上版之《季沧苇书目》，字画圆润苍劲，刻印不失原书神韵，可作识别黄氏题跋手迹的有力参考。由此可见，清代苏州刻书虽不如有明一代之盛，但刻、藏书家仍名家辈出，蒋吟秋《吴中藏书先哲考略》列出仍有四十五人。在此，我们只能择其中对学术文化有较大贡献，并至今对研究中国古籍有重大影响者，简要介绍于后。

首先就是何义门、黄尧圃、顾千里三人。

何义门，名焯，初字润千，哭其母，更字岷瞻，晚号茶仙，先世曾以义门旌，学者称义门先生，康熙癸未进士。全祖望《长州何公墓志铭》云：“公笃志于学，读书茧丝牛毛必审必核，吴下多书估，公从之访购宋元旧槧及故家钞本，细仇正之。一卷或积数十过，丹黄稠叠。”其门人陆锡畴曰：“吾师最谨慎，又不肯轻易著书。苟有所得，再次详定，以为可则，约言以纪之，积久成《道古录》若干卷。……年来颇有嗜吾师之学者，兼金以购其所阅经史诸本，吴估多冒其迹以求售，于是有何氏伪书而人莫之辨。”沈彤《何先生行状》：“先生蓄书数万卷，参稽互证，于其真伪是非皆有题识，其校定两汉书、《三国志》最有名。”家有赧砚斋，著有《义门读书记》，至今仍是研究古籍极重要的参考书。

黄丕烈，字绍武，号尧圃，或署“尧夫”、“老尧”，以藏书校勘名于世。凡黄氏题跋识语都为后世所宝。收藏宋刻百余种，称其藏书楼为“百宋一廛”，刻有《士礼居丛书》，并校订

翻刻宋本多种。道光二十五年，乌程范锴所著《华笑庵杂笔》卷三记载黄氏刻书云：“吴郡黄尧圃主政丕烈，藏书甚富，宋元版及影钞旧本，无不精善。尝出示士礼居刊行书目，其书价册数均注明某书之下，并记付梓之岁，录之以备后有观览者。《国语》五册，《汲古阁书目》一册，《国策》九册，《博物志》一册，《季沧葦书目》一册，《百宋一廛赋》一册，《梁公九谏》一册，《焦氏易林》四册，《宣和遗事》二册，《輿地广记》七册，《藏书纪要》一册，《三经音义》一册，《仪礼》三册，《船山诗选》二册，《周礼》九册，《洪氏集验方》二册，《夏小正》一册，《伤寒总病论》三册，《汪本隶释刊误》一册，前有‘书价制钱七折’六字，后有‘滂喜园黄家书籍铺’、‘苏州玄妙观察院场’两图章。其《百宋一廛赋》为嘉庆七年所刻，为黄氏手写上版，刻字工人为夏天培，刻印俱精。”其别号见之于题跋者曰“尧夫”、“复翁”、“复初氏”、“复斋”、“复见仙翁”、“一阳更生”、“廿止醒人”；五十岁后自号“知非子”，晚年又自号“抱守老人”、“秋清逸叟”、“六十老人”、“独树逸翁”、“龟巢老人”。其他如“尧圃主人”、“士礼居主人”、“小千顷堂主人”、“黄氏仲子”，比较常见。其斋名曰百宋一廛、读未见书斋、陶陶室、求古居、听松轩、陶复斋、养恬书屋、红椒山馆、太白楼、石泉古舍、联吟西馆、学耕堂、见复居、悬桥小隐、学圃堂、仪宋堂、小菱芦、学山海居等。其藏书校勘，是清三百年间大江南北之巨擘，中国藏书家之一大掌故也。

顾千里，原名广圻，润濱是其别号，千里是他的字。顾氏反对校书妄改古书，他很佩服北魏时代一位大儒邢子才。邢子才读书发现错误，只是考求正确的字句，而不主观轻易改动，曾说过一句名言：“日思误书，亦是一适”，因而取“思适”二字做书斋的室名，更自号为“思适居士”。

他六岁丧父，幼年多病，但在孤苦的环境下从不废学。十六

岁时遇明师张思孝，对他有很大帮助的是同学程士途。程家藏书极富，顾氏在程家遍读所藏，为后来博学多闻奠定了基础。二十五岁，又从学于江声。江是东吴经学大师惠栋的弟子，研究经学、小学有很高成就，所以顾氏又得到经学、小学方面的汉学真传。他的从兄顾之逵（抱冲）也是藏书校勘名家，其藏书室曰小读书堆，顾千里于其家得到传读借校的便利。他又在黄丕烈家塾教书很久，曾一度移居黄氏家中借窗读书，尽窥黄氏所藏奥秘。所以顾氏一生没有一天离开过书，同时得到名师益友帮助，以及自己刻苦钻研，成为一代校勘名家，就不是偶然的。清代乾嘉之际，正是校勘学已届成熟时期，出了不少优秀的学者，顾千里实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代人校刻了很多书：代其从兄顾之逵校刻的有宋槧《列女传》，代张敦仁校刻的有宋抚州公使库本《礼记》，单疏本《仪礼》，代秦恩复校刻的有北宋本《骆宾王集》、足本《吕衡州集》、宋本《李元宾集》，统称《三唐人集》，代秦氏刻的还有宋治平本《扬子法言》，道藏本《鬼谷子》，唐卢重元注《列子》，合称《秦刻三子》；还有北宋本刘球《隶韵》，唐赵元一《奉天录》、《词学丛书》等。代胡克家校刻的有宋淳熙尤延之本李善注《文选》和元兴文署本《资治通鉴》，代吴鼐校刻的有宋本《韩非子》，元本《晏子春秋》，代汪士钟校刻的有宋单疏本《仪礼疏》，宋本《鸡峰普济方》、《刘氏诗说》、衢本《郡斋读书志》，代洪莹校刻的有宋槧《名臣言行录》、《隶释》和《隶续》，代孙星衍校刻的有《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代汪喜孙校刻的有汪容甫《述学》和《广陵通典》。他自己校刻的有明吴元恭本《尔雅》和段玉裁的《释拜》。此外，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也是顾千里代为校刻的。凡是顾千里校刻的书，都是选择最好的本子，又用几个本子互校，校勘所得写成考异、识误或札记附后。其校书皆有依据，从不凿空，论古书舛谬处，细若毛发，棼如乱丝，一经剖析，豁

然而心开目朗，对后世校勘学起了典范的作用。

有清一代，苏州藏书家，除前述黄丕烈等三人外，比较著名的还有：

叶树廉，一名万，字石君，世居洞庭山中，常游虞山，乐其山水，遂家焉。所至必聚书，常捐衣食之需以购书，多至数千卷。每遇宋、元抄本，虽零缺单卷必重购之，其所得书，皆条列部居，精辨真贋，手识其所由来，其藏书题跋，多题“南阳穀道人”、“南阳道穀”，其室曰“朴学斋”、“归来草堂”。

惠周惕，原名恕，字元龙，康熙辛未进士，所居曰红豆书屋，自号红豆主人，有《惠氏百岁堂书目》三卷。其子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居吴县东渚村，晚自号半农居士，乡人因其斋名称红豆先生。惠栋字定宇，号松崖，周惕孙，幼笃志学问，雅爱典籍，得一善本，倾囊勿惜，或借读手抄，校勘精审，于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所收藏书有惠栋定宇红豆山房所收善本诸印，编有《惠定宇书目》。

朱奂，字文游，与惠栋有莫逆交，家有滋兰堂，藏书甲吴中。

顾嗣立，字侠君，康熙壬辰进士，博观书画，旁收碑碣，辑刻《元诗选》四集。家有秀野草堂，藏书甚富。藏书印有“侠君图记”、“閻丘小圃”、“秀野草堂”、“顾氏藏书”等。

吴铨，字蓉斋，雍正中为吉安守，归田后居濱川遂初园，读书其中，架上万卷皆秘籍也。以生于新安璜源，因题其藏书处曰“璜川书屋”。

金檀，字星輶，原籍浙江桐乡，流寓苏州桃花坞，其藏书处曰“文瑞楼”。

余萧客，字仲林，别号古农，人称盲先生，年十五通九经。闻有异书，必假钞录。同邑朱奂藏书甲吴中，馆之滋兰堂，因得

博览，终夜不寐，遂患目。构一室，无窗户，上穴一方以通天光，设修几，书册鳞次，潜心研究，著《古经解钩沉》。

周锡瓚，字仲漣，号漪塘，又号香岩居士。喜藏书，与黄丕烈过从甚密，每购一书，必往借所藏秘本校正之。其藏书处曰水月亭、漱六楼。子谢盒，号研六居士，家藏书极富，丹黄校勘，无间寒暑，纂《群书缀拾》一百四十卷，荟萃诸家题跋，诸藏书家之一大掌录也。

袁廷桢，字寿阶，一字又愷，家枫江，有小园，得先世所藏五砚为楼藏之，称五砚斋。蓄书万卷，皆宋元槧刻及金石碑版法书之属。于书无不读，尤精于小学，名其室曰红蕙山房。

张绍仁，字学安，号初庵，一号巽翁，喜藏书，藏书处曰绿筠庐、执经堂、读异斋。

韩崇，字履卿，号南阳学子。其藏书处题宝铁斋、宝鼎山房。

陈埶，字仲遵，号苇汀。藏书处曰西畴草堂。

清代后期苏州藏书家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汪士钟的艺芸精舍，顾沅的艺海楼，潘祖荫的滂喜斋、功顺堂，蒋凤藻之铁花馆、心矩斋，叶昌炽的缘督庐、奇觚廋，江标之灵鹫阁，在近代藏书家中，皆名重一时，影响深远。

汪士钟，字闾源，蓄志收书，以家藏四部书为寻常习见之本，必广搜宋元旧刻及四库未采者。后尽得黄尧圃、周香岩、袁绶阶、顾抱冲四家之书，取宋元本别编其目，各成一册。摹刻宋本《孝经义疏》、《仪礼单疏》、《刘氏诗说》、《郡斋读书志》诸书，校对精审，举世珍若拱璧，是清代吴中藏书之渊薮。可惜至咸丰庚申（1806）散佚。后来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都是汪氏旧藏。

顾沅，字湘舟，所居辟疆园，收藏旧籍及金石文字甲于三吴。藏书有“古吴武陵叔子湘舟珍藏印”、“武陵怀古书屋收藏印”、“顾沅湘舟氏印”。杨钟羲称：“顾湘舟艺海楼藏书不及四

库六百种，而四库未收者二千余种，亦吴下嗜古者之巨擘也。”咸丰庚申之变，其所藏为丰顺丁雨生捆载以去。《持静斋书目》所载多其家书也。

潘祖荫，字伯寅，小字东塘，咸丰壬子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光绪十六年卒，谥文勤。所藏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其藏书印曰“八求精舍”、“龙威洞天”、“分厘百宋遂架千元”。曾延叶昌炽馆于滂喜斋，尽窥帐秘。每读一书辄为解题，成《滂喜斋读书记》二卷。

蒋凤藻，字香生，雅好觚翰，嗜书成癖，任福建福宁知府时，得明徐兴公，谢在杭及带经堂陈氏遗书，遂蔚为大国，延叶昌炽刊《铁花仿宋本六种》及《心矩斋丛书》。

江标，字建霞，号师杭，自署笞谄，光绪己丑进士，官编修，嗜书，真知好学。对宋元刻本，旧抄旧校，源流真贋，了如指掌，辑刊《灵鹫阁丛书》五集五十六种。

叶昌炽，字鞠裳，晚号缘督庐主人。光绪己丑进士，官侍讲，校勘学冠绝当代。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蒋氏铁华馆丛书、潘氏功顺堂丛书均为其所审定。又括隐历代藏书源委，为《藏书记事诗》七卷，至今仍是研究古籍版本之必备参考书。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也是清朝统治力量日渐衰微的转折点。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学术文化上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带来了西方新的印刷技术，出现了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版企业。其结果，一方面是促进了我国近代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国古代的雕版刻印书籍的急剧衰落。鸦片战争后，上海闢为对外通商口岸。中国近代出版事业首先发达于上海，苏州地近上海，当然不能与之匹敌，雕版刻印书籍之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由于苏州自古以来，曾是刻书的中心，私家藏书著称于全国，所以承历代之余绪，自清末至民国私人藏书家也有六十余人，其中顾麟士的过云楼、曹元忠的笈经室、王同愈的栩园、吴梅的百嘉室、潘承原（博山）、承弼（景郑）的宝山楼等，仍名重一时。有的延续到民国，到1949年解放时仍未完全散佚。

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我国于维新变法后，也出现了近代的图书馆事业。中国最早出现的一批图书馆，都是由公私藏书楼转化而来。苏州于清嘉庆九年（1804）两江总督铁保及江南巡抚汪志伊，于苏州府学东沧浪亭北之可园，以白云精舍为基址，建立正谊书院。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十四年（1888），江苏布政使黄彭年来藩苏州，建可园藏书楼五楹，名为学古堂，储四部书四万余卷，包括少量新译泰西算学、声光化电等书。光绪十六年（1890）刊《学古堂日记》四十种二十六册，内容多经史考据著述，由雷浚、汪之昌辑。至1919年藏书已达二万四千六百另三册。宣统间，江苏存古学堂用木活字印《经学文钞》十五卷，首卷三卷三十册（梁鼎芬、曹元弼辑）。民国三年（1914）沈维骥呈请江苏巡阅使韩国钧筹办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这就是现在苏州市图书馆之前身。正谊书院、学古堂的旧藏，就是现在苏州市图书馆古籍藏书的基础。

在民国时期，随着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苏州也建立了很多大、中学校，这些学校也都建立图书馆，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东吴大学（现江苏师范学院，近又改称苏州大学）图书馆。中学有国人自办的振华女校，建长达图书馆。余如省立苏州高级中学，以及基督教会办的晏成、慧灵、景海、桃坞、萃英、英华等中学，都有规模不等的藏书基础。在公园内还有吴县县立图书馆。

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公立图书馆形同点缀，有志之士如沧浪亭原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蒋吟秋先生、编目部主任王饯（佩诤）等，虽致力于古籍的保存和收藏，但限于经费，所获极

微。然于抗日战争期间，该馆所收藏的古籍善本也幸赖蒋氏移藏洞庭西山，才得以保存完璧至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是中国人民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图书出版事业，对千余年来积累保存的文化典籍，保护不遗余力。1949年五月，苏州解放以后，苏州市人民政府重视发展图书馆事业及古籍文献的收集。1950年苏南文管会收集的于土地改革中没收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藏书，移交给江苏省博物馆三万四千余册，其余大都归入市、县公共图书馆收藏。现我们苏州市图书馆的藏书已达八十余万册，其中古籍达二十五万册，其规模和数量是历史上苏州的公私藏书楼所无法比拟的。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图书馆、苏州医学院图书馆、丝绸工学院图书馆、中医院图书馆、苏州博物馆资料室、西园、灵岩山及寒山寺之藏经楼，都保存着丰富的古籍文献，成为人民共同享受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化遗产。

在文化革命十年动乱中，散于民间的私人藏书虽然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损失，但这些公藏图书都保护完璧。苏州市图书馆还于十年动乱初期“破四旧”时，组织力量于废纸堆中抢救了不少古籍。如常熟毛晋汲古阁影宋抄本《孝经》、《论语》、《孟子音义》就是一例。在此期间，政府还拨款万元，收购了《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三十二卷十四册，是南宋建阳刻本中之精品。宋嘉定五年章贡郡斋刻本《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是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旧藏，也可以说是十年动乱中之劫余，是吴中藏书的一大收获了。

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谆谆嘱咐“要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指示，于全国范围内开展善本的普查及编目工作。我们苏州市从1977年开始至1979年四月，历时二年有半，共收录上报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苏州医学院图书馆、

中医院图书馆、西园藏经楼等所收藏之古籍善本一千四百十一部，三万八千另二十九册，并于1980年编印了《苏州市古籍善本书总目》，集苏州古籍珍本之大成。苏州自宋元以来，公私刻书事业，绵邈不绝，历代藏书名家辈出，度藏古代文献典籍，蜚声全国，历尽沧桑，得以存此精华，确非易事。

然而，古籍文献之保藏，终有极限，为发扬古代文化之精英以为今用，如何利用今天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印刷方法，使硕果仅存的宋元佳槧，历代旧刻，刊印流布，实为当务之急。解放以来，出版部门对此已做了大量工作。就我馆收藏而言，江苏人民出版社曾标点排印《苏州织造局志》，北京中华书局翻印了乾隆刊本《宋诗百一钞》，上海古籍出版社翻印了《古今图书集成》的总编辑陈梦雷所著《闲止书堂集钞》。现在国家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准备更有计划地翻印出版古籍文献，这是我国古籍出版史上的划时代的大事。苏州的古籍文献，今后得以刊刻流布全国，有裨于发展学术文化，为四化建设服务，诚千古未有之盛事也。我们应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克尽全力，共襄是举，使苏州的文化典籍，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文编写过程中，曾与瞿冠群同志讨论，得到修正补充。特此致谢。）

主要参考书目：

-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
- 陈彬和：中国书史
-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识
- 蒋吟秋：吴中藏书先哲考略
-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
-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及其影响
- 郭味渠：中国版画史略

北京中国书店：中国版刻图书源流（初稿）

苏州博物馆：苏州文物资料选辑

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古籍善本书目录

叶德辉：书林清话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

王佩诤：续补藏书纪事诗

李庆涛：关于明代中叶翻宋仿宋刻书

（青海省《图书馆杂志》1981年1—2期）

《吴县志·艺文》

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

《〈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已出版

《〈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已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姚柯夫同志汇编。该书是王国维的文艺批评论著之一。他倡境界，主自然，比严羽的兴趣说、王阮亭的神韵说，胜出一筹。篇章不过数千字，但见解非常精到，并且有所创新，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人间词话》自1908年发表以后，就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七十多年来，经过不断的研究、注疏、收辑和增补，先后印行了十多种版本。

为了给教学、科研工作和一般读者，提供一点阅读王国维有关资料的方便，该书将王国维《人间词话》及其评论文章汇编成册，以供参考。该书第一部分是《人间词话》不同版本各条词话的汇编，第二部分是解放前后发表的关于《人间词话》的评论、札记文章四十多篇。对《人间词话》所涉及的文学、美学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将会从中获得助益。

• 中原 •